

贝·布托传

二十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One Hundred Biographies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Giants
in the 20th Century

巴

贝·布托 / 著

刘建立 / 译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将门虎女

——贝·布托自传

[巴基斯坦] 贝·布托 著

刘建立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宋长琨主编,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12

ISBN 7-5387-1629-7

I. 20… II. 宋… III. 军政人物—列传—世界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0903 号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将门虎女——贝·布托自传

主 编: 宋长琨

责任编辑: 叶天洪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32 开

印 张: 13.5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1629-7

全套定价: 1390 元 单册定价: 27.80 元



1998年，贝·布托陪同丈夫走上法庭。



1988年11月，贝·布托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选举中当选为总理。

贝·布托总理会见美国总统布什。





贝·布托和家人一起合影。



贝·布托生下女儿后同母亲和姐姐的合影。



前言

我始终相信历史文献的重要性。1977年，当我的父亲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政府被推翻的时候，我曾鼓励与他接近并一起工作过的许多人，写一些有关父亲那个时期的事情。但是，在巴基斯坦继之而来的军法统治的艰难岁月里，参加过我父亲政府的许多人，正在忙于同军人当局的迫害和加在他们头上的伪假案件进行斗争。其他人都流亡异地了，而且他们又从未接触过我父亲和其同事们的私人文件。我自己则忙于恢复巴基斯坦民主的斗争，并且在未被起诉的情况下，被监禁了好几年。这种情况使我不可能就父亲的政府提笔著书。

在流亡国外两年之后，当我于1986年4月返回巴基斯坦时，一百多万同胞上街欢迎我，使我突然成为国际上极为关注的人物。骤然间，许多人邀请我写书，但不是要我写父亲的事，而是写我自己。我犹豫了。写经过民主选举就任巴基斯坦总理、并取得了与其名字相符合的不朽业绩的父亲是一码事，写我自己则完全是另一码事。因为，我从事的十分重要的政治斗争还有待进行，提笔写自己未免有些妄自尊大。我认为，一个人写自传是晚年的事，意在回首过去。

一位朋友的谈话无意中改变了我的想法。她这样对我说：“事



情不记载下来就记不住了。”我明白了她的意思。我和许多巴基斯坦人一样，经历过军法统治的黑暗年代，但许多人却不能像我一样有机会把这些经历记录在案。更重要的是，要让全世界都记住自哈克将军政变以来，我们在巴基斯坦所饱尝的痛苦。

这本书的写作一直是很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重现过去的痛苦。然而，写书又是感情经历悲痛后的净化，它使我第一次敢于面对我一向试图逃避的记忆。

这是我的自传：我亲眼目睹过的事件；亲身经历过的事件；引起我作出反应的事件。这虽不是对巴基斯坦的深入研究，但却是对从独裁统治向民主过渡的社会的一瞥。让这本书也成为对自由的呐喊吧。

贝娜齐尔·布托

1988年6月21日于巴基斯坦卡拉奇



目 录

前 言	1
（一） 父亲被谋杀	1
狱中岁月	23
（二） 被软禁在家里	23
（三） 在阿尔穆尔塔札宅院写下的回忆录	51
（四） 被关押在苏库尔监狱	191
（五） 被监禁在卡拉奇中央监狱——母亲曾被关过 的牢房	221
（六） 在临时监狱又被单独关押两年	241
向独裁者进攻	267
（七） 流亡国外的岁月	267
（八） 弟弟沙阿之死	296
（九） 返回拉合尔和 1986 年 8 月大屠杀	328
尾声 我的婚事	368



1

(一) 父亲被谋杀

他们于1979年4月4日凌晨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将我父亲杀害。当时，我和我的母亲被监禁在不过数英里以外空旷的西哈拉警察训练营地。我清楚地记得父亲死去的时间。尽管母亲事先给我安眠药吃，以便捱过这痛苦的一夜。可是，凌晨两点时，我还是蓦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直楞楞的：“不！”我喘不过气来，也不想喘气。“爸爸！”“爸爸！”我感到冷，尽管天气很热，还是止不住地打哆嗦。我和母亲谁也说不出安慰对方的话，只是在这空荡荡的警察营房里抱在一起，消磨时间。我们已准备好黎明启程，陪送父亲的遗体到我们家的祖茔地。

当监狱看守来见我们的时候，母亲十分厌倦地对我说：“我现在要恪守回避的规矩，不能见外人。你跟他们说话去。”母亲已经开始了寡妇与陌生人回避四个月零十天的日子。

我来到水泥地面已经龟裂的前屋。这个屋子是我们的起居室，满屋散溢着发霉腐烂的气味。

“我们已经准备好同总理一起走。”我告诉那个站在我面前的神情紧张的低级看守。

“他们已经把他送去埋葬了。”他说。

我仿佛感到当头一棒。“没有他的家属陪同？”我以十分严厉



的口气质问道：“即使军人当局的那些恶人们也是知道的，陪送他的遗体，为死者祈祷，安葬前瞻仰他的遗容，这些是我们家属的宗教义务！我们已经向监狱长提出了申请……”

“他们已经把他送走了。”他打断我的话说道。

“把他送到哪里去了！”

看守没支声。

“死得很安详。”他最后才回答，“我带来了遗物。”

他把我父亲在死牢里用过的物品，一件一件地交给了我。父亲的长衫和裤子：作为政治犯，他拒绝穿死囚犯人的号衣，这些长衫和裤子他一直穿到最后。送饭的饭盒：他在最后的十天里已拒绝接受送饭。铺盖卷：只是在床绳断了把他的背划破后，他们才允许他使用自己的铺盖。他的喝水杯……

“他的戒指呢？”我问道。

“他有戒指吗？”

我盯着他。他这时才开始磨磨蹭蹭地摸他的口袋，摸他的包，把我父亲的戒指交给了我。在最后的日子里，父亲的手指已经枯瘦了，戒指老是滑脱下来。

“安详。死得十分安详。”他一再低声地说。

被绞死怎能是安详的呢？

由于当局不提供我们食物，我家的两个仆人巴希尔和易卜拉欣也跟我们一起来到这里，为我们做饭。他们俩进了屋。巴希尔一认出了我父亲的衣服，顿时脸色煞白。

“真主啊！真主啊！他们把老爷杀了！他们这帮人把他杀了！”巴希尔喊叫起来。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劝阻，他已拎起汽油桶把汽油倒在自己身上，要引火自焚。母亲奋不顾身地跑上前去



阻止他。

我站在那里，十分茫然，不相信也不愿相信父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第一位由人民直接选举当选的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死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自1947年巴基斯坦成立以来，将军们一直统治着这个国家，他们的暴政祸及全国，是父亲第一次给巴基斯坦带来了民主。在巴基斯坦，人民曾经像过去数世纪一样，过着听受部落头人和地主摆布的生活，是父亲实施了第一部从法律上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人民为了推翻这些将军们，曾不得不再再付诸暴力和流血斗争，是父亲确保了文职政府的议会制度和每隔五年举行一次的大选。

不，这是不可能的！父亲是巴基斯坦第一位到过这个国家最边远和与世人隔绝的农村访问的政治家，成千上万的村民呼喊着“布托万岁！布托万岁！”热烈欢迎他。他的党——巴基斯坦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并执政后，他开始实施他的现代化纲领。他把少数封建主世代拥有的土地分给穷人；为饱受愚昧之苦的千百万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把国家的主要工业国有化；保障最低工资额度；确保职业受保护；禁止歧视妇女和少数教派。因此，成千上万的人高呼“布托万岁！布托万岁！”他的政府在执政的六年中，给过去一直深陷在黑暗中的国家带来了光明。然而，到了1977年7月5日清晨，光明消失了。

齐亚·哈克，正是这位曾被认为忠于我父亲的陆军参谋长，在深夜里派军队推翻了我的父亲，用武力接管了国家。齐亚·哈克，正是这位军人独裁者，接着就对我父亲的追随者进行迫害。但是，尽管他动用一切手段，使用枪炮、催泪弹，实施军法统治条例，也未能把他们镇压下去；尽管他把我父亲关入死囚牢实行单人监禁，



也未能摧垮我父亲的精神。齐亚·哈克，正是这个丧心病狂的将军，残酷地杀害了我的父亲。齐亚·哈克，这个将军后来对巴基斯坦实行了长达九年的残酷统治。

我呆呆地站在这位低级看守面前，抱着那个小包裹——父亲所遗留下来的全部东西。他的衣服仍散发着花露水香味。我把他的裤子紧紧抱在怀里，顿时想起凯撒琳·肯尼迪来。她在自己的父亲、参议员肯尼迪被刺杀之后，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穿着父亲的皮外衣。在政治上，人们总是把我们两个家庭相比较，视为门当户对。如今，又有了一个新的纽带把我们两家更紧密地连结起来。那天夜里，还有以后的许多夜里，我睡觉时总把父亲的上衣放在枕头下面，尽量让父亲靠近我身边。

我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深感茫然。虽然如此，在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里，我除投身于反对哈克军人当局加在父亲头上的冤案的斗争外，再无别的心思。我同巴基斯坦人民党一起，为大选进行斗争。哈克在发动政变时曾许诺举行大选，但后来预料到我们肯定获胜，又取消了大选。我6次被军人当局逮捕，并一次一次地被军人当局禁止进入卡拉奇和拉合尔。母亲的处境同样如此。在父亲被监禁的时候，她是人民党代主席，也被拘禁8次。这次我们在西哈拉被监禁6个星期，之前在拉瓦尔品第已被软禁6个月。尽管如此，在昨天以前，我仍不相信哈克将军真的会谋杀我的父亲。

我的两个弟弟因政治原因正在伦敦流亡，为反对父亲的死刑案而进行斗争。谁能把这消息告诉他们呢？我的妹妹萨纳姆正在哈佛大学读最后一年级。谁能通知她呢？我非常担心萨纳姆。她一向不关心政治，然而却也同我们一起被卷入这个悲剧中来。她



现在很孤独吧？我为她祈祷，她可千万别做出任何愚蠢的事来。

我感到身体仿佛真的散架了。我怎样才能重振精神，继续战斗下去呢？尽管我们尽了一切努力，还是未能保住父亲的性命。我感到自己太孤单了，实在太孤单了。在他的死囚牢里，我问过他：“若是没有您帮助我，我能做什么呢？”我需要他在政治上指导我。虽然我有哈佛和牛津两个大学的文凭，但我不是政治家。然而，他又能说什么呢？？他爱莫能助，只是耸耸双肩。

父亲去世的前一天，我最后一次见到他。那次见面带给我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没有人告诉他次日清晨他将被处决。没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世界各国领导人，如：吉米·卡特、玛格丽特·撒切尔、列昂尼德·勃烈日涅夫、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英迪拉·甘地，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叙利亚等许多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都曾正式地要求军人当局宽恕我父亲。当然，哈克当局的懦夫们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向全国宣布处决我父亲的日期。他们惧怕人民对杀害他们的总理将作出的反应。只有我和母亲知道，但也属偶然和仅凭推断。

4月2日清晨，我还躺在行军床上，母亲突然来到我屋里。“平奇！”她叫着我的小名儿，但她的声调使我立即怔住了。“外面有军官，他们说今天我们要俩去见你父亲。这是什么意思？”我完全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她也同样完全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俩谁也没有勇气说出来。那天是我母亲的探监日，她获准每个星期去探望我父亲一次。我的探监日期规定在每周的晚些日子。他们要我们俩一起去，只能意味着这是最后一次探监。哈克要动手杀害我父亲了！

我急切地思索着。我们得设法把情况传递到外面去，向世界



各国和巴基斯坦人民发出最后的呼吁。可是，已经没有时间了。“告诉他们我身体不好，”我急忙地对母亲说，“告诉他们，假如这是最后一次会面的话，那我一定要去。但是，如果不是最后一次会面的话，我们明天去。”母亲去告诉看守了。我则立即撕开已经封好的信，重新再写。“我认为他们是在要我们去见最后一面。”我迅速地给在外面的一个朋友写道，希望引起党的领导者的警觉，由他们通报外交使团和动员人民。人民是我们的最后希望。

“马上把这个交给亚斯敏，”我对我们忠实的仆人易卜拉欣说道，同时，心中十分清楚我们在冒着极大的危险。他已没有时间等待一个要么同情我们，要么懒散粗疏的看守来换班时再行动。他可能被搜查或被跟踪。他不能再采取正常的谨慎方式去办了。虽然危险是大的，但是事情也同样是重大的。“去，易卜拉欣，去！”我催促他，“告诉看守，你是去为我买药的！”听我说完，他马上跑了出去。

我从窗户里往外看，看到军官们先是在商量什么，然后用无线电报话机报告我病了，等候指示。在他们还不知如何处置的时候，易卜拉欣已经到了大门口。“我得给贝娜齐尔小姐买药去。快，快让我出去！”他对早已听说我病重了的看守们说。非常幸运，易卜拉欣被放出去了，而且是在母亲第一次来到我的寝室仅仅5分钟之后出去的。我的双手禁不住地颤抖。这封信能不能安然无恙地送到，我心中没有一点把握。

窗外报话机哇喇哇喇地响了。“因为你女儿身体不好，你们可以明天去见。”当局最后通知我母亲。我们为我父亲赢得了多活24小时的时间。但是，当看到易卜拉欣刚跑出去，院子所有大门就立即关闭时，我们明白不祥之兆预示的事就要发生了。



要战斗，我们得战斗。然而，怎么战斗？我被监禁在铁窗里面，感到束手无策。而时钟却在朝着父亲死亡的时辰嘀嗒嘀嗒地逼近。信能送到吗？政变以来一直面临着枪炮和刺刀的人民能起来行动吗？谁来领导他们呢？巴基斯坦人民党的许多领导人被关押在监狱里。我们成千上万的支持者也同样被关押在监狱里。我们的妇女支持者在巴基斯坦历史上也第一次被关进监狱。还有无数的支持者遭受着袭击和鞭笞。他们的罪名只不过是提到了我父亲的名字。他们遭受鞭笞的次数印记在他们半赤裸的身体上。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能对这最后的呼叫作出反应吗？更何况他们还不一定能听到这最后的呼叫呢！

晚上八点一刻，母亲和我便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电台的亚洲节目。我身上的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当电台报道我从监狱送出的明天——4月3日是我们最后一次与父亲见面的消息时，我满怀希望地靠近收音机坐下来。信送出去了！我等待呼吁人民起来抗议的报道。然而，没有听见。相反，电台接着报道说这条新闻并没有得到监狱长的证实，并援引了我父亲的一位前部长的话，称“她吓坏了。”母亲和我连相互对视的勇气也没有了。我们的最后希望破灭了。

我们离开西哈拉去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一路上，我们乘坐的吉普车风驰电掣地奔驰。道路两旁站岗的保安部队的后面是胆战心惊的群众，他们对他们总理的命运一无所知。监狱的层层大门急匆匆地打开，又急忙关上。在我们离开西哈拉监禁所时，女看守对我们搜了身。到了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时，我们被再次搜身。

“你们俩为什么一起来到这里？”父亲从地狱般的牢房里问